

中国近代 社会与文化研究

李喜所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中国近代 社会与文化研究

李喜所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智福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李喜所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 7-01-003866-X

I. 中… II. 李…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475 号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ZHONGGUO JINDAI SHEHUI YU WENHUA YANJIU

李喜所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24.75

字数:718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3866-X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自序

本书是从近 20 多年来我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中选编的一本论文集,内容主要涉及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五四运动 80 年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更新,故名《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这些论文是在特定时代制约下所形成的学术环境当中,本人的学术水准和所能接触到的历史的真相互动的结果。换言之,这些研究历史的论文本身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且已经变成了历史。如今自己回过头来去重新阅读,也不时涌现过去的场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可以讲是先天不足,后天亏损;既谈不上家学,又没有赶上系统而深厚的学校教育,只是凭着一种执著的追求和比较刻苦的奋斗精神,才取得了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聊以自慰。

我出生在大太行山区南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自然条件恶劣,文化资源匮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甚至认为蓝天是由大山支撑着,我的最美好的愿望是爬到山顶用手去摸一摸光溜溜的蓝天。直到有一天,慈爱的父亲背着我来高山之巅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于是一种强烈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愿在我心里深深扎根。上小学后,初识一些文字,总想找一些课外书看,但家里除了我的课本是找不到任何书的,从左右邻居家中也只能借到几本旧得不像样的《西汉演义》、《薛仁贵征东》之类的通俗读物,但我爱不释手,读起来津津有味,至今记忆犹新。小学学校的课外书几乎没有,记得学校用公费只订了一本《小朋友》杂志。杂志一到,大家争着抢着去看,有时争抢过分,常常把《小朋友》给撕坏了。我的好多知识,如孙悟空的故事等,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到了 1957 年,随着政治运动的增加,学校里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记得我们那一年的暑假特别长,现在才知道那是老师们都“反右派”去了。第二年,在大炼钢铁、

放“卫星”、夺高产的大跃进的强劲“东风”吹拂下,我们这些小學生也不得不卷入捡废铁、下田劳动的大潮中去。这种基本不读书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59年。那时我已经变成了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不料,大跃进余波未尽,1960年的非常时期就到来了。为了减少政府压力,学校将一半学生下放回家,余下的也以“保命”为主,很少上课。1962年我考入高中后,赶上了难得的三年稳定时期。现在回想起来,那三年我学到了很多東西,让我终身受益。1965年,我幸运地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9月1日报到的那天,学校正召开高年级学生下乡参加“四清”的动员大会。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认为能去搞“四清”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我们刚入学的新生,有不少人向领导写申请,要求走出书斋,投入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极左思潮”已经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大学一年级还没有度过,1966年春末夏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只好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革命”了一年多,眼看着运动遥遥无期,我也渐渐变成了“逍遥派”,躲在图书馆里看书。说真的,那两三年,还真看了不少书,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由于我参加“革命斗争”少,“派性”不足,1970年意外地被“工宣队”留下来做了“革命教师”。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缺少教材。在河北师院苑书义教授的联络下,华北六校的近代史教师聚集在北京师院(今首都师大)编写教材。经过“文革”煎熬的这些苦命的教师有了这么一块“静土”,可以安心读书写作,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热情很高,几乎每天都要奋斗到晚上两三点钟。我作为编写组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更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百倍努力工作。两三年后,我基本翻阅了近代史的基本史料和相关论著,还在与前辈们的讨论中学到了研究问题和写书的一些基本方法,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巨大。当然,那时“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那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让近代史学界的任何人去编教材,都只能是很“左”的东西。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自己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人民出版社林言椒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又重组编写组,全面修改已经出版的教材,三卷本百余万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终于在80年代初问世了。

8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求变的时代。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思想

空前活跃,新观点层出不穷。在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整体走向和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各种新的看法,这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使我的学术创作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那些年,我的新想法接二连三,想做的论文题目时常在脑中涌现。特别是1981年冬天,我的论文《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在全国青年论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更激起我饱满的研究热情。我钻在图书馆里一干就是一天,晚上睡觉也很晚,生活中除了学术,还是学术,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三到五篇。对外的学术交往也十分频繁,大概每年至少要参加三四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1986和1987年分别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谭嗣同评传》和《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将我的学术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热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到近代史学术界,就是对传统的“革命史观”的反思,逐步涌现出一种近代化或曰现代化史观,也就是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看作一个近代化的过程,用近代化去重新透视近百年的历史。我也逐步接受了这种“近代化史观”,并指导我的学术研究。客观地讲,在80年代末,近代史学界同行多数都接受了这种理念,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革命史观”有多大的过错,只是在学术变迁中反映了学界的一种新的认知。历史地看,“革命史观”是革命年代研究者对近百年历史的一种解读;“近代化史观”则是现代化年代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又一种诠释;二者是否定过程中的传承关系。我一向认为,历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客观现实,现实发展了,史学研究才会发展;否则,历史学就缺少活力,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踏步不前。

90年代中国学术界转向了求实。就总体上讲,似乎人们关注的“热点”不再是那些“新潮”的东西,而是倾向于扎实而具体深入的学术探讨。在这种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都有新的拓展。我的研究则较80年代更具体而深入,先后出版了《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梁启超传》(与元青合著)等八部专著,同时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也有一定的进展。先是被美国黄兴基金会聘为研究教授,后作为客座教授往德国明斯特(Munster)大学讲学,

1998年又作为交换研究员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同时往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加拿大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大大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增强了世界意识,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件、人物的理解也大不一样了。在世界逐渐变成“地球村”的时代,关起门来做学问已经不可能了。尤其是研究近代史,更必须有全球理念,因为近代就意味着世界的连成一片。以环球视角看近代中国,很多问题会理解得更准确一些。值得庆幸的是,在较广泛的对外学术交流的推进下,我在90年代还完成了三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1.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薛君度教授合作的《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2.与德国特里尔(Trier)大学乔伟教授合作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3.与英国诺丁汉(Nottingham)大学摩根(Morgan)教授合作的《20世纪三四十年的中国留英学生》。

总起来看,到目前为止,我的学术道路虽然艰辛,但还算平稳;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不能讲没有遗憾,但基本感觉良好。粗略归纳起来,受研究兴趣和一些客观条件的左右,近20多年我主要集中在了“中外文化与近代社会”的研究上,也就是从中外文化关系来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具体来讲,一是选择中国留学生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体,考察留学生与近代社会变革的关系;二是着眼于典型人物、重要社会思潮和流派以及各种文化现象,探讨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三是具体剖析社会各个层面的特点和走向,包括社会阶层、政治派别、各种社团、乡村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本书所选论文,虽然三方面的比重不大平衡,但大致反映了这个总体布局。实事求是地讲,我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只能是抛砖引玉而已。盼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乔还田先生出力最多,在此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刘晓琴同志帮助校阅和核对引文,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2002年暑假于美国、加拿大旅次

目 录

自序	1
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解放	1
中国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	5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11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理性思考	16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	19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24
从今文经学到经世致用	28
鸦片战争时期的睁眼看世界思潮	41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64
龚自珍的呐喊	76
魏源的眼量	90
洋务运动与认识世界	104
晚清洋务思潮兴起的必然性	119
关于洋务派的两点新思考	131
洋务派引进先进生产力述论	139
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变革	149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165
马建忠与中西文化交流	178
评述王韬及其文化思想	186

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195
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	208
戊戌变法与教育改革	216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	233
评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的日本观	245
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256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	264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274
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	286
谭嗣同与自然科学	301
简析谭嗣同的信佛	310
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15
关于义和团的真假问题	325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	338
略论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352
辛亥革命与思想启蒙	359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370
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	402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	415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427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	446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459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467
武昌起义后的国民“参政热”	481
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	499
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物价	525

民国初年生活观念和习俗的变迁	530
孙中山与梁启超	543
青年黄兴的军人品格与尚武精神	554
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564
评黄兴武装反清的战略和策略	578
中国留学潮的回顾和展望	592
中国留学生与传统文化	604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612
容闳与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生	624
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欧学生	639
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	648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	687
清末的留学管理	693
甲午战后五十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	706
中国留日生与拒俄运动	720
宋教仁留日时期的思想特点	729
清末民初的留美学生	738
中国留学生与五四运动	749
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文化交流	764

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解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醒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导,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制约着政治革新的程度乃至成败。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几千年来从未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随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的追求、探讨和宣传,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虽然都失败了,但再次证明了人们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到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讲的都是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思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相当一批人所接受,于是出现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对于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重大变革,因为在中国封建的法典上找不到要把外国人的“技术”拿来维护“天朝上国”的条文。于是引来了顽固派的一系列攻击,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的“长技”不但解救不了清廷的危机,反而会败伦常、坏人心,使中国不成其为“礼义之邦”。可见,办洋务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要从理论上透彻地加以论证,使人们从封建传统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但是,很可惜,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大都不懂理论,他们手下也没有高水平的洋务理论家,他们培养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也没有在这方面作文章,他们注重的是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洋务派在和顽固派的论争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例如在关于海防、同文

馆的兴建、要不要修铁路等争辩中,很少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虽然洋务派最后还是战胜了顽固派,但这是一种“权力”压服,并非从理性上解决问题。洋务派官僚只知变“事”,不知变“理”,洋务运动缺乏真正的思想基础,更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所以,尽管李鸿章等人有权有势,也难免以失败而告终。诚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不从理论上更新人们的思想,只知“摸着石头过河”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和洋务运动不同,戊戌变法则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开始的。就在洋务运动后期,一些了解世界局势又善于沉思的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就批评办洋务的不足,提出学西方的根本是变革政治制度,设议院,改官制。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中,反复介绍西方的议会、学校、财政以及各种制度,虽然这是一种传声筒式的介绍,但毕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甲午战后活跃起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较王韬等人深入了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他们了解的那一点西学经过消化吸收,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古香古色地鼓吹维新变法,在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与此同时,严复在天津努力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使知识界耳目一新。紧接着,维新志士开始办报刊、开学堂、建学堂,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终于促成了 1898 年的“百日维新”。

然而,戊戌变法是短命的和不彻底的。这从他们的理论宣传上也可以找到原因。康有为等人在理论探讨上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变法才能救中国,人们接受得比较多的也是“变”的思想。如何变,变以后出现什么后果,他们很少论及。加之这些人当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旧势力认识不足,变法的艰巨性更未想到。他们所写的理论著作,影响面也是有限度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主要波及于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中;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较通畅,影响面也限于部分知识界;严复的译著,读的人也有限,《天演论》的真正社会影响是在 20 世纪初年;谭嗣同的《仁学》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抨击清廷的民主性,但秘未传世,戊戌变法之后才出单行本,而且康有为等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的传统理论从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由

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却千方百计地论证维新变法如何符合封建圣人们的教诲,他们的思想主张如何与封建理论合拍。当守旧分子揭穿他们的老底之后,康有为等除了搪塞,就别无良策了。这种理论探讨得不深入,限制了康有为等维新变法思想的发挥,也决定了戊戌变法的软弱无力。退一步讲,就是康有为等人这种不深入、不完备的维新变法理论,其影响面也不大。这种思想解放的幅度,当然不可能对抗深化到一切领域的顽固而强大的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所以,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是有限度的,作为其政治反映的“百日维新”就更难尽如人意了。

如果说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是以温和的、合法的、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包裹在孔孟儒家思想中的方式出现的,那么,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则是激烈地、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因为在20世纪初年,清廷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队伍,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特别是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大辩论,这就促成了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颇具规模的较自由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结束。思想解放对政治变革的促进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很充分。但是,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既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孙中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时,人们提出的研究课题虽然很多,但真正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并为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的仅是“革命排满”,其他都是“夹生饭”。所以,清廷一倒,革命党人的绝大多数都迷失了方向,连章太炎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鼓吹起开明专制来了。那个不是满族人、又有实力、善于耍两面派的袁世凯成了多数革命者向往的“强人”。“非袁莫属”不仅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分子的心声,南方的革命派中也很少不人云亦云。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孙中山的被迫让位就势所必然了。辛亥革命只能把皇帝赶跑而建不起民主共和国。政治变革的程度再次受到了人们观念更新程度的制约。

五四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年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从刊物的

内容来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虽然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这个杂志出了一年,改名《新青年》,并号召青年要有新的觉悟,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来。当时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自己,并有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爆发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

总之,近代历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理性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变革。

中国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

发展过程

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具体可分为鸦片战争后的萌发期、洋务运动中的形成期和戊戌维新运动时的扩展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事实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这种思想震动是巨大的,有头脑的人不得不去问一个为什么,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的情况,还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目的就是重新认识西方的“蛮夷小邦”。他大胆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这些都具有对外开放的色彩。但林则徐作为清朝的大员以及当时的条件所限,还没有形成对外开放的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是在他的好友魏源身上萌芽的。魏源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改变,应该“师夷长技”。既要“师夷”,当然要对外开放。魏源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工厂企业,建议清政府在虎门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办厂,派中国的有识之士进厂做工学习。为了“师夷”,魏源经过多年努力编著了《海国图志》,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精神食粮。和魏源同时期的徐继畲也初步改变了中外隔绝的陈腐观念,编著了《瀛环志略》,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同时大赞华盛顿创建美国的功勋,称其为“异人也”。富有改革精神的姚莹为获取世界知识,曾多次提审鸦片战争中俘虏的英国士兵,还参阅世界地图,研究西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他批评守旧官吏闭关自守,坐井观天,不知西方为何物,这必定“误天下国家也”。总之,鸦片战争时期的有识之士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认识到了两点: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是先进的,清廷要反侵略,必须把这种“长技”

想方设法学到手;二、中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研究西方,“天朝上国”的观念应该改变。这种认识显然是模糊的、不深刻的,但毕竟萌发了开放的思想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步兴起的洋务运动,使“师夷长技”的思想变为具体行动,特别是涌现了一批有思想、敢议论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理论家,使开放意识成为朝野上下一股不大不小的新型思潮。这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大都有一定的世界知识,不少人曾亲自涉足西方,他们善于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中外对比中去论证清廷的改革方向,所以他们的开放意识就有一定的哲理性和说服力,能够给沉闷的思想界注入新的生机。那位近代率先赴美留学的容闳就曾多次呼吁中国开放,并具体提出中外联合开发长江、中外合资修铁路的建议。他经过多年努力,先后带领詹天佑等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是清廷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容闳的基本思路是,把美国式的西方文化灌输于中国,使清廷这样的封建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西学东渐记》)。曾经游学欧洲的王韬,有较系统的开放“理论”。他明确指出:“当今之时,处今之世,固非闭关自大时也”(《弢园文录外编》)。在王韬看来,“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漫游随录》)。王韬这种发人深省的见解集中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呼声。试翻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何启、宋育仁等人的文集、日记、书信,几乎都在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关于开放的论述占相当比重。他的结论是:中国欲自强,只有开放,特别在各国侵略中国之际,“我不能闭拒阻遏也”。如果不向西方各国学习,“知我之短,知人之长”,那是“粉饰自欺”!就是尧、舜活到现在,“终不能闭关独治”。如果将改良派的这些言论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开放主张基本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改变了传统的从中国出发去观察世界的思维逻辑,从世界来看中国,把开放作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趋势加以论证,说明清廷能否开放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大问题;二是将开放作为一种中国自我生存、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反复强调把西方“长技”学到手,与外人开展“兵战”、“商战”乃至“学战”,也就是中国

应该兵强、国富、文化发达；三是把开放的内容具体化，包括引进技术、扩大贸易、合资办厂、开采矿山、派留学生、办学堂、译西书等一系列措施，“出于夷而胜于夷”，使中华民族后来居上，这种开放意识已具有浓厚的近代色彩了。

戊戌变法将人们的开放意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标志是将对外开放和内政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开放促进变法，以变法保证真正的开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改革家在激烈呼喊开放的同时，要求清政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内政。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写的七上皇帝书，严厉批评了闭关自守的守旧思想，反复论证了在各国“争雄角智”的时代，中国只能作为竞争中的一员，走向世界，发愤图存。他认为“中国今日，已非一统闭关之时”，“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无他途”。凡是西方各国的长技，都应该“通晓而摹仿之”；凡是“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上清帝第六书》）。梁启超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认为封建时代“闭关画界”，不与各国往来，还勉强可以存在下去，如今处列国竞争之中绝对不行。地球上各国相通，这是“天道也。人力虽强，可逆天乎？故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中国人至愚极陋之言也”（《梁启超选集》，第66页）。处在世界竞争中的清廷，变亦变，不变也得变，否则自取灭亡。敢于“言人所不敢言”的谭嗣同在《仁学》中严密论证了闭关自守使中国日益沉沦的历史教训，指出“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他认为中国要办的所谓“洋务”，其实都是必须办的实事。不仅政治、经济上要开放，社会风俗文化也应与西方沟通，取长补短。严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开放言论深入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文化领域等较高的层次，给中国人以新的思想启蒙。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开放思想，是要从观念上和思想政治领域来一次彻底的变革，使中华民族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康有为的“博爱”，梁启超的“民权”，谭嗣同的“平等”，严复的“自由”，构筑了一个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框架。这不仅引导了戊戌时期一代人的观念更新，而且为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动提供了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中山的开放思想，就是戊戌时期乃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批判闭关自守、重新认识世界的继续和